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

——思想渊源、实践基础和理论逻辑

冯维江 张宇燕

【内容提要】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在中国兴起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新的学科和理论。从思想渊源看,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家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对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与扬弃以及对西方国家安全理论的汲取和超越。从实践基础看,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的复杂斗争环境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具备鲜明实践品质的学问。它强化了新时代国家安全意识,推动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反对腐败提升政府效能等方面的重大实践。从理论逻辑看,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聚焦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的哲学特征。在世界观层面,它阐述了国家安全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属性;在认识论层面,它指出了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的实质;在方法论层面,它强调工作向上对发展与安全的统筹、对防范风险与处置风险的统筹、对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的统筹等注重科学统筹的方法。围绕国家安全的斗争与合作实践仍在进行,作为理论和学科的新时代国家安全学也将不断完善。

【关键词】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利益

【作者简介】 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73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9)04-0004-24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和错误由笔者负责。

一 引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今之人需要主动承担起回答新时代新问题的责任。亟待回答的问题不再囿于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领导人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矢志回答的如何实现发展、实现怎样的发展的范畴,^①不再限于解决“不发展”的问题,还包括众多“发展起来后”的问题。这些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并不比不发展带来的问题少,甚至更多更复杂。^②

处理更多更复杂的问题,需要在更加明确细致的分类基础上找准病灶、对症下药。概言之,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③例如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中低端供给与升级的需求不匹配以及某些高附加值服务业和高技术水平不够发达等。这些问题从长期看,需要靠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来从根本上解决;从中短期看则需要协调利益关系、及时化解冲突,避免矛盾激化影响社会安全。第二类是发展过程中的负外部性问题。例如环境污染、

① 邓小平高度关注发展问题,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提出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之一,明确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0、1235页;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江泽民指出,“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8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认为“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②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常常以为,一些矛盾和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少造成的,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减少。现在看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新形势下,如果利益关系协调不好、各种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导致问题激化,严重的就会影响发展进程”。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1—82页。关于发展起来后问题更多更复杂的判断,习近平系引用邓小平晚年的话。邓小平当时主要是针对贫富差距问题做出的判断,这番话在新时代意义更加凸显。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高能源资源消耗、“颓废荒诞世代”^①等带来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统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安全,将发展与安全的综合成本明确化、内部化。第三类是发展后带来的成果保障与地位维护的问题。从绝对收益意义上的发展成果保障来看,国家越是发展,需要保障其安全的发展成果的规模越大,面临的安全压力会随之增加。^②从相对收益意义上的地位维护来看,国家发展后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必然造成原有守成大国地位相对下降。守成国由于恐惧而可能与发展起来的崛起国之间爆发战争,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③。如果不能短期内迅速超越守成国并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崛起国越是发展其面临的来自守成国的安全压力通常越大。这类问题很难(至少在特定时间内很难)在发展框架下解决。

无论上述哪类发展起来后的问题,都包含了安全的因素,从而不单纯是发展的问题或只靠发展就能够有效解决的问题。对当前的中国来说,发展仍是第一要务,是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但国家安全也已经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头等大事。^④在此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应运而生。

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主体内容,其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的概括,可以归结为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其中,五大要素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五对关系就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⑤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在五大要素五大关系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

①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一代人中的一些群体在生存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之后,因为阶层固化、奋斗目标丧失等原因表现出相对于主流社会异常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其做法的流行和扩散往往对社会生产力和秩序造成负面影响。在美国有“垮掉的一代”,在日本有“低欲望社会”和“宅”文化,在中国有“佛系”(与日本的低欲望社会相似)、“巨婴”(生理年龄成年而心理年龄不成熟),等等。

② 感谢江涌研究员指出这一点。

③ 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傅强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④ 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00页。

⑤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1页。

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①

二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思想渊源

作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主体和中心内容,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被列入《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的行动指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的指引思想一样,尽管党和国家领导人本人是主要创立者,但这些思想并非领导人个人的成果,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据以结晶的源泉或资源,既有作为“本来”或思想本源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道统以及蕴含着丰富思想资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②也有其他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③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同样具备上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理论品质,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对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与扬弃以及对西方国家安全理论的汲取和超越。

(一) 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饱含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色彩。马克思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④根据恩格斯的总结,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规律。^⑤列宁认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面的统一。^⑥毛泽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4页。

② 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64页。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以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等三方面资源。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④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4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5页。

⑤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2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3页。

⑥ 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东强调运用辩证法要克服片面性,^①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②要注重实践的作用。^③邓小平在党内高级领导中较早提出照辩证法办事,^④他尤为强调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来认识和解决问题。^⑤江泽民提出,为了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需要把握好国际形势的总体趋势,而看待国内外大势,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⑥胡锦涛认为,在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等全局性问题的若干领域,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重点发展,重点突破。^⑦总体国家安全观所阐述的五对关系,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做到的“五个坚持”^⑧以及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⑨的风险治理思路等,均体现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蕴含的一切从当前中国发展与安全实际出发,辩证对待各方面矛盾,在对立统一运动的发展变化中应对处置风险、动态实现国家安全的要求。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安全的人民立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阶级社会的国家是最强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⑩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277页。

② 毛泽东指出,“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见毛泽东:《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③ 毛泽东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④ 毛泽东在1949年前后不同场合说过“邓小平同志讲:事情怎么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这样的话。参见毛泽东:《时局问题及其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257页;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00页。

⑤ 邓小平指出,“从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去想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见邓小平:《按照中国的情况写中国的文章》,《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9页;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⑥ 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⑦ 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⑧ 即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坚持立足于防,又有效处置风险;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坚持科学统筹。

⑨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82页。

⑩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

会之间的时期,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在这个时期国家安全也主要体现为维护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安全,为此人民群众可以收回国家政权,“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②列宁进一步阐释了国家作为“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的观点,反驳了社会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自行消亡”论的歪曲,指出在无产阶级的镇压力量通过革命来替代资产阶级镇压力量之前,国家不可能自行消亡。^③在这里,国家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安全的暴力工具,确保国家安全则体现为这一工具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手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性,他一方面带领全党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④另一方面坚持相信人民、发动人民,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斗争,^⑤开创性地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邓小平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视为国家安全得到可靠保障的前提。^⑥江泽民高度关注人民在实现国际安全中的作用,一方面强调维护本国主权和安全是每个国家人民的神圣权利,^⑦另一方面指出国际安全或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各国人民携手实现。^⑧胡锦涛提出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高度理解和平与发展,倡导各国人民携手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⑨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首次从中央层面明确、彻底和全面阐述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坚持人民立场和群众路线的基本原理,强调“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页。

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第195页。

③ 列宁:《国家与革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194页。

④ 毛泽东这方面的论述非常多。例如,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表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又如,他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人民求解放;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⑤ 例如,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表示,“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问将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又如,他在《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电报》中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8页。

⑥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6页。

⑦ 江泽民:《国家主权是一国人民充分享受人权的前提和保障》,《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114页。

⑧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页。

⑨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①指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并要“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②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安全观提升到新的境界。

(二)对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与扬弃

关于国家安全的宗旨或本质内涵,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民为本的传统思想,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国家安全工作导向。《荀子》有“爱民而安”的论断,^③《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④《吕氏春秋》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⑤《史记》中说“制国有常,利民为本”,^⑥苏辙讲“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⑦朱熹讲“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⑧ 这些观点不仅强调了人民大众的安全而非统治者本人的安全才是国家安全之本,还指出了爱民、利民、为民除患是实现人民和国家安全的途径。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习近平多次引述《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提法,阐述了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各项工作要以人民为中心的道理。不仅如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还批判了传统民本思想中隐含的统治阶层居高临下的牧民思维,明确了“爱”“利”和“除患”的标准是由人民自己而非统治者说了算,应以人民自身的感受为准绳的立场。^⑨

关于国家安全的外延或具体任务,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构建集重要安全领域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囊括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或政治家所关注的几乎所有重要国家安全领域,且随时代的进步有极大的扩展,从而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建

①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01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9—50页。

③ 王先谦集解:《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36页。

④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

⑤ 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⑥ 司马迁:《史记·赵世家第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07页。

⑦ 陈宏天、高秀芳校点:《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3页。

⑧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7页。

⑨ 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安全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1页;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习近平:《登高望远,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日。

设指明了现代化的方向。《管子·牧民》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认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①这涉及国家安全中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墨子·七患》所谓“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②显示社会安全、粮食安全对于国家安全十分重要。《金史·左企弓传》所录“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的诗句,^③反映了时人对国土安全的重视。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财之不丰,兵之不彊,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④强调的是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和行政安全等领域面临挑战将给国家安全带来重大风险。凡此种种,大多包括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要求构建的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以及生物安全、深海安全、极地安全和外空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之内。

关于国家安全风险挑战因素的来源与分类,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区分内忧与外患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加细致科学的区分和谋划。古代关于内忧外患的论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作为内因的内忧所引发的安全问题居相对主导地位,也是主要的安全关切之所在。如《论语·季氏》中“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常被引申为祸乱之源在内部,^⑤《三国志·魏书》云“天下犹人之体,腹心充实,四支虽病,终无大患”,^⑥苏洵在《审敌》中说“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⑦都是这个道理。二是对内忧中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进行了区分。如《管子》的“五害论”,^⑧强调的是国内发生水灾、旱灾、风雾雹霜之灾、瘟疫和虫害等对国家安全构成挑战,而《左传》提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⑨则把内患指向政府官僚体系内部的贪腐邪恶。三是认为外患之“外”不是绝对的,一定条件下可能转换为内忧。如苏洵在《审敌》中进一步论述了“古者夷狄忧在外,今者夷狄忧在内”,由外患引发国内严重财政问题进而影响民生和国内稳定,“名为外忧,而其实忧在内也”的道理。总体国

① 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页。

② 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9页。

③ 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24页。

④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7页。

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0页。

⑥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00页。

⑦ 苏洵:《嘉佑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⑧ 黎翔凤:《管子校注》,第1054页。

⑨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9页。

家安全观对上述三个方面的情況都有所考虑,^①并且除提出统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之外,还提出加强对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以及发展和安全等更多维度安全范畴的全方位统筹。

关于处理和应对国家安全风险和挑战的原则与举措,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汲取了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多方面的探索成果。例如,在居安思危的基础上,突出了临危不乱、化危为机的要求。《周易·系辞下》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②《左传·襄公十一年》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③类似的格言古代文献中比比皆是。习近平在不同场合也引用前述格言以及“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备豫不虞,为国常道”等古语来说明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道理。^④不仅如此,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还提出“立足于防,又有效处置风险”,^⑤“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⑥以及辩证看待危亡局势,从消极态势中寻找积极因素,“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的更高要求。再如,在中国古代思想强调应对国家安全风险重在用人的基础上,提出在能力建设上要善于用制度抓“关键少数”的观点。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认为,一方面重要岗位须选贤任能,所谓“理乱在上也”,^⑦“授有德则国安”,^⑧“天下安危,宰相之能否可见”;^⑨另一方面要防范官员本身成为祸乱之源,“强臣专国,则天下震动而易乱”。^⑩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则强调国家安全是中央事权,强调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还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履行国家安全责任提出具体要求和警诫,“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

① 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充分考虑了国家内部的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风险以及外部风险。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载《求是》,2016年第1期,第3—10页。

② 郭彧译注:《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89页。

③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994页。

④ 习近平还特地区分了可以预见的风险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后者与苏轼所谓“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相类。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26页。

⑤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8年4月18日。

⑥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载《求是》,2016年第1期,第3—10页。

⑦ 黎翔凤:《管子校注》,第472页。

⑧ 黎翔凤:《管子校注》,第14页。

⑨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80页。

⑩ 陈宏天、高秀芳校点:《苏辙集》,第351页。

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① 中央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确立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来从机制和制度上明确各级“关键少数”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责任。又如,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强调维护国际安全、共同安全,习近平提出旨在实现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等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都含有传统文化“推己及人”思想的成分。《礼记·礼运》曰“人不独亲其亲”,《论语》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梁惠王上》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观念,奠定了中国文化包容性的底色。在安全领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同样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色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共同安全”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的概念首次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之内,以党内宪制责任的方式第一次确立了对共同安全的维护之责。

(三)对西方国家安全理论的汲取和超越

西方国家安全理论有其历史悠久的渊源和蔚为大观的脉络,与古代中国独尊儒术之后大致能形成一种主流思想有所不同,西方包括国家安全理论在内的各种学说大多在激烈的相互竞争中演进,其间彼此抵牾者有之,砥砺相明者有之,最终呈现出精粗混杂、短长互现的理论格局,而主要西方国家立基于这些理论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各有其特长和局限。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主体和中心的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秉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积极吸收西方国家安全理论与战略中的有益养分充实和完善自身。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承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但反对唯利益论。西方现实主义立场的国家安全理论多强调国家寻求权力以保障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或国家的生存。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最重要的利益是生存,保障国家生存最重要手段就是拥有强大的军事权力,国家会不断寻求权力以确保生存。各国都如此行事并相互怀疑,最终导致“安全困境”和“零和博弈”。^② 结构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最关心的并非权力而是安全,其对权力的追寻存在一个国际结构决定的临界点,在此范围以内获取权力会增加安全,超出这个限度地追寻权力,可能促使其他国家开展军备竞赛从而恶化其安全,所以国家应追求有限权力来维护均势。^③ 与结构现实主义强调的国家追求适度的权力不同,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决策者无法衡量多少权力才是适当的,所以根本无法通过追求适度的权力来维护国家安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可以全球扩张,在考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82页。

② 代表性著作如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代表性著作如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虑特定的技术和地理约束条件下,进攻性现实主义提出“全球霸权不可能实现”的理论主张,认为“大国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是成为地区霸主”。^①新现实主义则提出“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社会需要霸权国家来作为包括安全秩序等在内各种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②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带有强调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理论色彩。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安全、繁荣、价值观和国际秩序视作美国的持久利益,^③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后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声称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核心。^④与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国家安全理论和战略相比,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虽然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等核心利益,但也强调各方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和坚持正确义利观,认为各国应当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旧观念,通过对话协商来化解利益冲突,既不能惟力是视,也不能唯利是图。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支持通过国际合作或国际机制来维护共同安全,但致力于降低国际制度的非中性色彩。^⑤西方自由主义立场的国家安全理论摒弃了现实主义的國家中心范式,强调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认为,由于现代国家之间多种联系渠道的存在,武力不再是攫取权力的唯一重要手段,国际组织的作用会得到加强。^⑥凡尔赛和会之后产生并在冷战后重新引起关注的集体安全论认为,应当发展一套从整体角度防止或控制战争的国际制度,为此各国共同约定以暴力改变现状为非法并将受到外交、经济甚至军事等方面的集体制裁。欧洲裁军和安全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共同安全的概念。^⑦与集体安全论相比,共同安全论强调与对手一起而不是针对对手获得安全,由此反对威慑的原则和思维方式。联合国发展署1994年提出“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将安全拓展为一个包含了发展的概念,扩大了安全威胁的类型和领域,意味着安全也适用于粮食、健康、环境、人口增长、经济机

①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② 代表性著作如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译:《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ebruary 2015,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2.pdf, 访问时间:2019年3月8日。

④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访问时间:2019年3月8日。

⑤ 所谓制度非中性,即同一制度对不同的利益主体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参见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改革》,1994年第2期,第97—106页。

⑥ 代表性著作如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⑦ Andrew J. Pierre, “Reviewed Work: Common Security: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 by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Issues,” *Foreign Affairs*, Vol.61, No.1, 1982, p.221.

会不平等、移民、毒品及恐怖主义等领域。^①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也认为,良好的国内外制度环境对维护人民多维度安全需求极为重要,但决定制度环境的最重要的主体还是国家。国家可以通过改革国内外制度来推进共同安全。但是,由于制度非中性的存在,现有的国际组织及其制定的规则往往更多反映确立这些制度的大国的利益。正所谓“大就要有大的样子”,这个“大的样子”不是固化有利于大国的非中性制度,而是尽量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中性从而也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重视观念性因素的作用,但其倡导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了物质第一性原理。持建构主义立场的国家安全理论认为,物质力量固然重要,但信念、规范、价值、文化和认同等观念性因素,在围绕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外交政策相互作用过程中也起着决定性而不是第二位的作用。^② 例如“文明冲突”论指出,决定未来冲突的是文明和文化,预测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会因为差别的扩大和矛盾的增长爆发战争。^③ “民主和平论”则认为,持相同的所谓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且持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不易卷入战争。^④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也重视观念或精神范畴的作用,但与上述理论不同之处有三:其一,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倡导命运共同体意识,但并不认为止步于意识等精神范畴就可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所强调的命运与共是建立在作为先决条件的物质层面的安全和发展利益交融的基础之上的。其二,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倡导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包含着克己复礼、推己及人的要求,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安全中促进各国共同安全,强调“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⑤ 其三,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强调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建立在共同的物质第一性客观基础之上,因为这个共同的客观基础,人们不能通过向各自的神佛祈祷而让本族或本教人士自外于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外部威胁。

① 巴里·布赞、琳娜·汉森著,余潇枫译:《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

② 阿米塔·阿查亚著,王正毅、冯怀信译:《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③ 代表性著作如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④ 代表性的著作如 Robert I. Rotberg and Theodore K. 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88; 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3. 转引自李少军:《评“民主和平论”》,载《欧洲》,1995年第4期,第4页。

⑤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54页。

这个同一的基础为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的各地人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前提。^①

三 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实践基础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除向古今中外汲取智识养分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复杂斗争环境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具备鲜明实践品质的学问。与那些在温室或书斋里生长的学问有所不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不断完善,强化了新时代国家安全意识,有力推动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反对腐败提升政府效能等方面重大实践,由此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把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全面性、协调性和科学性提升到新的高度。

(一)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乘着经济全球化的东风,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各方面暴露出的矛盾风险挑战,还没来得及蔓延集聚爆发,就被巨大的增量发展红利所覆盖甚至消融。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后,尽管中国采取果断措施,复苏状况好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但受到的负面冲击仍在后续数年中逐渐显现并与经济结构性问题交织,经济增长率由2007年的14.2%跌落至2008年和2009年的10%以下,在2010年小幅回升至10.6%后持续下滑,2012年“破八”、2015年“破七”。原先被增量红利掩盖的经济社会矛盾开始暴露,并有相互交织而形成风险综合体的迹象。在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避免其形成风险综合体的过程中,新时代国家安全学产生并不断完善,发展出防控结合、标本兼治的安全风险治理策略。

在防范化解经济金融安全风险方面,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治本,同时着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有全球性、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但结构性问题才是根本原因。由此,中央提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从根本上应对,即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②与此同时,中央提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把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金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61页。

^②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融工作的永恒主题,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部署相关部门对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和异常交易行为的主体采取断然举措,避免了2015年“股灾”等严重影响金融安全的事件演变成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为各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了良好环境。

在污染防治及维护环境安全方面,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强调以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建设为本,着力防范和处理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风险和隐患。中央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应严格生态安全底线、红线和高压线,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为此,中央确立了以打赢蓝天保卫战为重点发起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主攻方向。2017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全国三大城市群全部超额完成了2013年设立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目标。2018年,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到202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2015年下降15%以上;PM_{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2015年下降18%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比2015年下降25%以上”的新目标。^①

在防范和打击“三股势力”方面,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强调将预防性反恐放在第一位,依法严厉开展反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斗争。如果将通过投入较高边际成本而取得的安全状态及维护安全状态的能力称为积极安全,那么消极安全则指不被迫进行或追加较高安全投入,可以在低边际投入状态下实现的安全。一般说来,主动作为的安全模式边际成本比较高,而通过良好的治理与行为、信任,以提升自身损失吸收能力和抗打击能力等方式增强安全韧性,这样实现的安全边际成本相对较低。从现实路径看,通过积极安全迈向消极安全,需要将严厉举措与预防性举措有机结合起来。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16年年底,“三股势力”在新疆等地共制造了数千起暴力恐怖案(事)件,造成大量无辜群众被害,数百名公安民警殉职,财产损失无法估算。^②邪不压正,为了将“三股势力”嚣张气焰打下去,新疆按照中央部署依法严厉打击,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积极安全。同时,新疆还通过改善民生、普法教育、语言和知识培养、技能帮扶以及去极端化教育等方式,从源头上消除恐怖极端势力的经济和思想根源,为消极安全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① 《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7/03/content_5303158.htm, 访问时间:2019年3月20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 <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49841/1649841.htm>, 访问时间:2019年3月20日。

(二)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实践

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的总和。^① 国家核心利益是国家利益之中不容牺牲、不做交易的那部分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摸索规律,形成了在动态平衡中统筹维稳和维权两个大局的科学方法,并以此指导实践,在维护海洋权益、保障网络安全、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以及维护海外利益安全等方面,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推动实现了区域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

在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中央通过指导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实现了对中日东海划界和南海问题的风险管控,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维护主权安全上的运用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中日东海划界问题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一直存在。2012 年 9 月,日本政府按照所谓钓鱼岛“国有化”方针决定从年度预算中拨款“购岛”,此举激化了中日矛盾。随即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见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表示日方应该悬崖勒马并明确要求美方谨言慎行,不要介入钓鱼岛主权争议。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的 12 月 12 日,中国首次在钓鱼岛开展海空立体巡航,明确在领土问题上的不退让态度。2013 年 11 月,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将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在内 3/4 的东海海域划入。最终,在日本挑起的东海争端里,中国顶住压力,采取一系列措施成功打破日本单方面控制钓鱼岛的局面,中日关系也没有走到图穷匕见的一步,并在近年还有所转圜。

南海问题同样由来已久。中国和东盟国家 2002 年共同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和平解决南海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2013 年 1 月,菲律宾违背之前与中国达成的共识,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对此,中国政府开展了及时有力的法理斗争。2013 年 2 月 19 日,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此后多次重申此立场。2014 年 12 月 7 日,中国政府发表立场文件指出仲裁庭不具有管辖权。2015 年 10 月 29 日,仲裁庭做出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中国随即声明该裁决无效。2016 年 7 月 12 日仲裁庭做出对菲律宾“一边倒”的裁决后,中国政府当即郑重

^①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第 47 页。

声明,该裁决无效、没有约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随后,中国政府还通过一系列声明和立场文件,还原中菲南海有关争议的事实真相,重申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和政策,争取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2016年6月,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担任新一任菲律宾总统后提出“建设建设再建设”的治国方针,在南海问题上转而采取搁置争议的立场。中国也在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强了和菲律宾的合作,支持其改善国内福祉民生。南海问题“降温”取得良好成效。

在维护国家安全核心利益免于外部威胁上,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近年来从保障网络安全和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等方面的实践中,总结出了较为丰富的维权维稳规律。中国是遭受网络黑客攻击的重灾区。2017年,位于境外约3.2万个计算机恶意程序控制的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约1101万台主机。^①尽管如此,美国方面不顾“棱镜门”披露出的其对全球大规模监听计划及其研发进攻性网络工具引发“想哭(WannaCry)”勒索病毒肆虐全球等事实,时常贼喊捉贼地指责中国破坏网络安全。习近平高度重视维护网络安全和网络空间国家利益,做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论断,一方面着力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另一方面提出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②特别是倡导尊重网络主权、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立场,赢得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赞同,从能力建设和话语权竞争方面双管齐下维权维稳,效果显著。除网络空间安全外,中国还有力维护核安全以及极地、外空、深海和生物等领域安全,并在推动相关领域全球治理合作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2018年以来,美国“规锁”中国的意图日益显著,^③中美贸易摩擦在美国步步紧逼下迅速升级,但在中国坚定而理性的回应下,中美经济关系没有出现塌方式崩溃。2018年年底,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达成共识,同意暂停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包括不再提高现有针对对方的关税税率以及不对其他商品出台新的加征关税措施,并决定由双方工作团队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加紧磋商,努力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推动双方经贸关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两国元首的政治决断

①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2017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 http://www.cac.gov.cn/wxb_pdf/2018year/situation.pdf, 访问时间:2019年3月14日。

② 四项原则是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五点主张是:第一,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第二,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第三,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第四,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第五,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32—536页。

③ 所谓“规锁”,就是要运用新的规则来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参见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载《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第24—25页。

为最终解决不断加剧的中美贸易争端打开了大门,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暂时避免了在贸易领域的“对撞”升级及其对两国与世界可能产生的严峻后果。同时,中国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压力而降低维护本国经济安全核心利益的要求,没有为了维稳而放弃维权。中方承诺愿意根据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国内市场和人民的需要,开放市场,扩大进口,这不仅是为了缓解中美贸易关系中美国对中方贸易盈余的不满,更重要的是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与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为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中方愿意根据国内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扩大进口,包括从美国购买适销对路的商品。“适销对路”反映了中方对美方适应需求的意愿、能力和灵活性的期待和要求。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海外利益规模越来越大,成为中国发展利益安全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截至2015年年末,中国海外资产总量达到6.4万亿美元,在境外设立企业约29700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8826.4亿美元,公民年出境旅游人数1亿人次左右。中央认识到,如此大规模的海外利益在国际上处于基本不设防状态,遇到重大风险除了撤侨外,对其他活动在全球各地的中国公民和法人缺乏其他有效安保力量予以保障,已经成为海外利益安全的突出短板。为此,中央提出加紧研究、加大投入、加强防范,逐步提高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保护我国海外公民和法人安全,保护我国海外金融、石油、矿产、海运和其他商业利益。^①一方面,政府加强了国内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协调机制建设,例如一些地方建立以“一带一路”建设境外安全保障工作协调小组为基础的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和企业、个人“五位一体”的境外安全保护工作机制。^②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还积极通过对外安全合作协调来帮助形成并有效运用当地安保力量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例如,在中方支持和援助下,2017年巴基斯坦内政部宣布成立由9个陆军营和6个民兵部队组成共13700人的中巴经济走廊特殊安全部队(SSD),专门负责中巴经济走廊项下项目及中方人员安全。这些内外部的机制创新,为维护中国海外合法权益和“一带一路”相关区域安全形势的稳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 习近平在2015年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了相关信息,但这些信息当时没有在新华社通稿中公开,后收录于《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18—219页。

^② 《贵州省推动企业沿着“一带一路”方向“走出去”行动计划(2018—2020年)》,http://www.chinaguizhou.gov.cn/system/2018/11/01/016896629.shtml,访问时间:2019年3月14日。

(三) 反对腐败提升政府效能的实践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认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形成维护国家安全强大合力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其中的“关键少数”,在构筑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进程中发挥着其他安全元素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就中国而言,有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是中国、中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维护新时代国家安全,关键在党。然而,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党及其领导下的干部队伍,如果不能长期保持公正廉洁的操守、与时俱进的效率效能和一锤定音的公信力,腐化堕落、慵懒懈怠和软弱涣散等消极因素就可能从内部侵蚀掉维护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为此,有必要以刀刃向内、刮骨疗伤的决心,及时向党和政府内的腐败、低效和投机行为发起坚决的斗争,并在自我革命的斗争实践中总结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规律。

反腐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鉴于任由腐败愈演愈烈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初步实现不敢腐的目标,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并巩固发展。同时还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出台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特权,彰显巡视利剑作用,实现中央和省级党委巡视全覆盖,从源头上、制度上管党治党,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到新的水平,为维护新时代国家安全准备了牢固可靠的组织基础。

提升政府效率效能方面,中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等要求,推进公共部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创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等方面的一些举措,如大规模减税降费等,可能触动政府的存量利益,不啻“割自己的肉”,也是“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改革”。^①例如,2019年减税和降低社保缴费措施,将减轻企业负担近2万亿元人民币,政府财力相应将出现缩减。减税降费、简政放权本身不是目的,在权钱上面做减法后,政府不能当甩手掌柜。“该管的还要管,上级部门放的权,下级要接住,不能出现真空地带”,^②要做到守土有责。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转变和精简来提升效率效能。具体到国家安全领域,一是做到管控纾解好公共部门改革过程中的消极懈怠抵触情绪,避免演变成风险因素;二是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建立完善各级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实现层层尽责抓好国家安全。

高的公信力可以大大降低政府应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成本。缺乏公信力,公共部门在

①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载《人民日报》,2019年3月16日。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20页。

处理国家安全事件时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即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公众都认为政府在说谎,从而拒绝配合甚至发生抵触对抗行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来源有三。一是公共部门自身严格依法办事。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府自身行为有章可循,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活动,既可为其他部门或市场主体做出表率,也可以为各方在选择和政府打交道的策略时提供稳定预期。二是公共部门要讲信誉,总体上能保持政策连续性,特别要杜绝“新官不理旧账”的情况发生。三是对出现的问题和错误,不讳莫如深或文过饰非,能及时认错、拨乱反正。正所谓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这么大的党和政府治理这么大的国家,难免出错。只要能尊重事实和法律,依法纠正重大冤假错案件不但不会降低公共部门声誉和公信力,反倒会让人民群众对其更具信心。以上三个方面,都意味着对公共部门的行为和权力有比较严格的约束。缺乏约束的权力不值得信赖,并且可能演变成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支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支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四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为中心的理论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汲取古今中外国家安全思想和总结民族复兴关键阶段国家安全丰富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其趋于相对成熟和确立的标志是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核心要素和“四梁八柱”,勾勒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理论逻辑。更重要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凝练归纳的总体属性,规定了新时代国家安全观有别于其他国家安全思想和理论的哲学气质。

(一) 作为世界观的总体

世界观是人对世界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从世界观的层面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反映的是新时代国家安全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属性,由此指向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同时,人类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① 越是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38页。

在这样的时代,人类越是渴望栖息于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之中。当前存在的共同风险和威胁以及人类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增强了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奠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基础。

要让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成为现实,需要把握国家安全的总体属性。第一,国家安全是整体的而非割裂的,这意味着不同领域安全风险相互传递、转换、交织,在一个领域发生的风险可能在另一个或多个领域爆发,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出现风险综合体。

第二,国家安全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这意味着任何领域任何区域都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安全。现在安全的地方未来可能出风险,现在安全矛盾挑战集中的地方,未来可能风平浪静。研判国家安全风险挑战的分布,必须考虑时间维度。

第三,国家安全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这一方面意味着国家安全风险挑战的来源不仅存在于内部,同样存在于外部,并不存在一道阻绝内外的风险隔离墙;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全球化时代,试图通过闭关锁国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安全,将面临更不可承担的成本和风险,立足开放环境,加强内外交流联系,国家安全能力和水平才会提高。

第四,国家安全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这意味着所谓总体安全就是重大国家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而并不追求完全没有危险和内外威胁的绝对安全状态,或为此无限投入安全资源和提升安全能力。世界上也没有绝对安全,只能立足基本国情保安全,避免不计成本追求绝对安全,否则不仅会背上沉重负担,甚至可能顾此失彼。

第五,国家安全是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这意味着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实现需要各个国家共同努力和携手合作。一国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之上,别国面临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来谋求自身安全。否则,不但不能实现独善其身式的国家安全,反倒可能引火烧身。

(二)作为认识论的总体

认识论是特定主体确信其对世界所秉持的基本立场之后确立的关于认识的本质及规律的理论。在认识论层面,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就是指对中国来说,必须按照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三位一体的方式来认识和理解新时代国家安全,才能推动引领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认为,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

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安全的准则。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各项权利,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为人民创造良好生存发展条件和安定生产生活环境。《说文》释,“宗,尊也。凡尊者谓之宗”“旨,美也”,①《玉篇》称,旨,“美也,意也,志也”。②从词义上看,所有美好意向和志趣中最受尊崇者,即宗旨。国家安全各要素中,以人民安全为最高尊崇,其他安全必须服从服务于人民安全。但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具有特定的阶级内容和历史内容。人民是相对敌人而言的,它反映了特定社会的政治关系。孤立地谈人民安全,无视其政治属性,则人民的概念容易被社会中的强势利益集团用自身狭隘利益所架空,而罪恶也会假人民之名以行。所以,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十分强调政治属性和政治关系,强调必须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这样才能真正保障人民安全和中国的国家利益。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把制度安全、政权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为国家安全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近代以来,中国饱受战乱动荡,历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磨难。在经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总统制等失败尝试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其所代表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维护党的领导、制度安全和政权安全是新时代政治安全的内在要求。政治安全是举旗定向的质性判别要素或指标。政治安全出了问题,其他基础、保障和依托性安全要素所保证的就可能是虚假的“人民安全”和错位的“国家利益”,这种情况下,越是强化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和国际安全等对“人民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支撑,反倒越会走向真正的人民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对立面。

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准则,就是要把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发点,牢固树立捍卫国家利益的机遇意识,强化捍卫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创新捍卫国家利益的方式方法,更坚决更有效地维护好捍卫好国家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国家利益是相对于国际社会而言的,表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国家利益至上,就是维护人民共同对外利益的安全,不能屈从于其他国家或国际行为体的利益。在主权国家时代,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是人民安全和政治安全的试金石。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或者代表人民的政治集团,在面对外部势力时,不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准则并按此准则行事,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让国家的生存和

①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202页。

② 顾野王:《玉篇》(根据张氏泽存堂本影印的《宋本玉篇》),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185页。

发展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这样的制度和集团要么是外国势力的代理,要么质量差、能力低,缺乏或丧失了代表人民和维护人民安全的先进性,都应当被清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中国的国体政体决定了党、人民和国家是一个共同体,^①必须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而不能把三者割裂或对立起来。那种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还是“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构建国家安全体系”对立起来寻求二中选择一的答案,或者问“人民安全/利益”和“国家利益”孰高的做法,都违背了三者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都是“不合法”的、错误的提问。错误的提问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三者有机统一的提出,深化了党对新时代国家安全的规律性认识。

(三) 作为方法论的总体

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特别是改造世界的理论。在方法论层面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主要是指全面统筹的方法。具体来说,包括工作导向上对发展与安全的统筹,对防范风险与处置风险的统筹,对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的统筹。

先看统筹发展与安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出现过三种工作导向。第一,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党坚持的是安全导向的治国理政模式。在此阶段,外部有“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干扰,内部有国民党特务、阶级敌人的破坏,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在严峻的内忧外患中维护新生人民政权和新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安全是最大的问题和压力。外交上强调“深切地同情并且积极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侵略的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②经济布局上开展了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等领域的三线建设,战略上为“美帝”“苏修”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做准备。各领域工作都有明显的安全导向的色彩。

第二,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党坚持的是发展导向的治国理政模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序幕。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内政外交国防等各方面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三个有利于”成

^① 钟国安:《以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谱写国家安全新篇章》,载《求是》,2017年第8期,第11—1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

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发展成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第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逐渐酝酿并提出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新的治国理政工作指向。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坚持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的同时,提出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是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保障,从而将安全也提升到发展的同一个高度上,两者的统筹成为衡量治国理政各方面工作(当然也包括国家安全工作)的辩证统一标准。

再看统筹防范和处置风险。应对风险是国家安全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中国已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越来越多并且不断积累,甚至进入集中显露期。中央指出,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必须把防范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力争不出现风险。除了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还要有应对和处置、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这样即便出现了重大风险,也能扛得住、过得去。立足于防又能有效处置风险,是统筹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的基本要求。

最后看统筹国家安全的维护与塑造。维护二字表明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采取防御性的总基调,正如在国防政策上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一样。而塑造则带有更具主动性和更加积极的色彩,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就是确立积极防御的国家安全方针。随着全球化深度发展,一国国内事务向世界溢出、扩散的现象日益突出。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家利益向海外拓展的范围和力度与日俱增,保护海外利益安全的需求日益强烈,前瞻性地塑造安全的迫切性不断上升。由此,在经当事各方同意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当事方内部事务,推动事态向有利于当事各方且符合国际公平正义原则的方向良性发展的“建设性介入”应运而生。^①除外交上的“建设性介入”外,战略上“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的要求,经济金融安全、社会安全以及核安全等领域标本兼治的方向,也都体现了新时代国家安全统筹维护与塑造的思路。

^① 冯维江:《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科学内涵、战略布局与实践要求》,载《国际展望》,2018年第3期,第13—28页。

五 结语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在中国兴起的关于国家安全的学科和理论。这一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家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理论,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超越和扬弃了西方国家安全理论及战略,在总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开展的国家安全斗争实践经验和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为主体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促进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围绕国家安全的斗争与合作实践仍在进行,作为理论和学科的新时代国家安全学也将不断完善。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实施意见》,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以此为契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学术共同体在加速形成之中,学科的组织建设、学术梯队的培养也将迎来新的高潮。本文是对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思想渊源、实践基础和以总体为特征的理论逻辑的初步梳理和概括,并不能够覆盖更不可能解决本学科的全部重要问题。例如,如何看待维护国家安全中斗争与合作的关系、如何将大国战略竞争导向“竞争性共荣(competitive co-prosperity)”,如何塑造中国特色大国安全、如何评价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适用性等重要理论和实践命题的解答,还有待于整个学术共同体的进一步研究。

(截稿:2019年3月 编辑:肖 河)